

「史通」理论体系研究

● 赵俊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史通》是中国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最系统严整的一部史学批评专著，但迄今为止学术界还缺乏对《史通》理论体系的研究。作者在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对《史通》作出了新的探索。

本文将《史通》理论体系的形成及诸特点，置于中国史学批评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考察，置于刘知几所处时代的各种现实矛盾斗争中考察，实事求是地说明《史通》理论体系的思想倾向、理论价值及如何在史学批评史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以期较恰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程度及重要学术地位，对于构建今天的、科学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提供必不可少的历史启示。

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谈《史通》理论体系的学术渊源，尝试对先秦至唐以前史学批评发展的基本线索做初步的爬梳工作。本章以具体史料证明，注重对史学研究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优良传统。《史通》并非平地楼台，而是自先秦以降史学批评不断发展进步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先秦时代是史学批评的萌芽阶段，两汉时代是史学批评逐步独立阶段，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史学批评长足发展阶段，隋唐时代，史学评论进入繁荣阶段，将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分解来看，许多观点甚至使用语句都可以从前人那里找到出处，但刘知几之前的史学批评是不成体系的，往往

是触事而发，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比较零散。至《史通》诞生，史学批评始形成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表明史家已能够对史学研究本身状况进行整体审视了。

第二章，考察《史通》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因素。唐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发展，决定了史学的发达程度，这是刘知几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原因。刘知几生活在唐代的初中期，此期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武则天执政并称帝近半个世纪。在各个领域里，世族地主官僚和新兴地主官僚进行着空前激烈的斗争。这些时代特点给《史通》打上深深印记。本章反对旧式学者脱离社会矛盾背景而孤立考察《史通》的作法，也不同意现在学术界流行的关于刘知几持世族地主立场的观点。根据多方面的史料考察分析，刘知几虽然在世族与庶族的矛盾斗争中有所依违，但其实际立场，是站在庶族官僚势力一边。他在政治上、史学上都适应了进步的社会潮流。

第三章，谈《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以往研究者曾对《史通》的内容、观点作过很多阐发，这是很可贵的奠基性工作。本文所作的努力是，将《史通》的各种内容、观点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内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展现分析，探求刘知几撰写《史通》的总体构思。初步探索表明，通常认为外篇为读史札记，抽外篇精华以成为内篇的观点，是不确切的。外篇与内篇分工不同，都属于一个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论体系由总纲和史制论、史家论、史书论和史评论所组成。在四论中又包含了更细密的层次。并且理论的构成有内在的逻辑关系。通过对结构、逻辑的阐说，表明《史通》理论的体系性特征及思维广度和深度。

第四章，谈《史通》理论体系的主要范畴。如果说上一

章是对《史通》理论体系的宏观考察，那么本章就是侧重于对《史通》理论体系的微观考察。在长期的史评实践中，形成了一些较基本的范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①史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史学批评范畴的演进过程。总体而言，史评范畴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朦胧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某一范畴也经历了内涵从贫乏到丰富，层次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要掌握史学批评史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必须揭示其主要范畴的演化轨迹及相互联系。因此本章在此方面努力作了尝试。

《史通》作为初唐以前史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其理论体系内包含了丰富的范畴，如文与史、文与质、曲与直、通与塞、貌与心、晦与显、简与繁、……等等。通过剖析诸范畴内涵并显示其承上启下的功用，可以对《史通》理论体系的内容实质有更具体、确切的把握，可以对《史通》在史学批评史上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有更具体、确切的了解。并且可以使史学批评史的研究相对精确化，对这些范畴的批判继承，对今日史学批评也是有所裨益的。

第五章，谈《史通》理论体系的基本矛盾。这一部分旨在探讨作为《史通》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的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特征。本章通过对刘知几思想各个侧面的众多史料的分析，认为现在学术界通常赞颂刘知几具有无神论倾向或达到了无神论、反对命定论、坚决反对把神话、图谶、寓言等神奇传说编进历史、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等等说法，是不够

^①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56。

恰当、准确的。关键是对刘知几有关论点未全面理解，将其思想中具有某些因素夸大为思想上的主要特征。实际上，刘知几对许多问题都存在着两重性的矛盾认识。他思想上存在一个“尚中”的原则，意在以以往学者的认识进行整肃，不偏不倚，纠正一切偏差。这种思想特征是精华、糟粕并存，既有朴素的辩证认识，又有调和折衷的观点。

这种矛盾不仅仅是刘知几个人认识问题，也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矛盾冲突的折射。刘知几之家世渊源为世族，但他在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利益都和以进士集团为核心的庶族地主势力联系在一起；他怀有清除政治弊端的思想，却又希望与世无争、思慎知足；他既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种种腐败之症，却又竭尽全力去维护这种制度；他既不满于封建史学的虚伪不实，却又坚持史学维护名教的立场。对于他的史学实践来说，巨大成就的取得和严重缺陷的表现，都基于这种矛盾。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史通》理论体系的学术渊源	11
一、先秦——史学批评的萌芽期	11
二、两汉——史学批评的形成期	21
三、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的发展期	37
第二章 《史通》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因素	58
一、刘知几作《史通》与当代社会政治	58
二、刘知几作《史通》与当代史学思潮	75
第三章 《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	90
一、《史通》理论体系存在的确实性	90
二、《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	93
三、《史通》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	105
第四章 《史通》理论体系的主要范畴	119
一、文和质	120
二、文和史	123
三、名和实	127
四、详和略	130
五、简和繁	132
六、晦和显	136
七、貌和心	137
八、才、学、识	140

九、通和意.....	144
十、兼善和偏族.....	146
十一、曲和直.....	148
十二、探源.....	150
第五章 《史通》理论体系的基本矛盾	155
一、一般性质的矛盾.....	156
二、对天人关系的矛盾认识.....	160
三、对社会历史演变及史学演变的矛盾认识.....	172
四、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矛盾认识.....	175
五、“尚中”的方法与实践.....	187
六、对刘知几及《史通》的评价中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	193

绪 论

本文所研究的是《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史学批评和史论是有区别的。

史论，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总结经验教训，评断是非功过。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以及《汉书》等正史中纪、传末尾的论、赞。亦有著作，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史学批评，是对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检讨史著、史家及其他史学现象，探寻史学研究的意义、观点和最佳方法，如班彪的《史记后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史传”篇，刘知几的《史通》。

简言之，史论表现的是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史学批评表现的是对史学研究的看法。

由于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巨大推动力，因而开展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对前人的史学批评进行一番认真的发掘清理，总结其经验教训及发展的规律，对于推动今天的史学批评的进步和提高史学研究水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对《史通》理论体系进行研究，是否有以下价值和意义：

一、探索《史通》理论体系，是全面把握刘知几史评理论，推进《史通》研究的关键。

《史通》问世之初，就曾被推许为宜置于史家座右。一千二百年来，历代学者对《史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唐柳璨的《史通析微》、宋孙何的《驳史通》，到明、清史家的诸多序跋、批校、注释、札记；从陈汉章、杨明照、

彭啸咸等的补释，程千帆、张舜徽、张振铎的笺记、平议和笺注，到刘汉、周品瑛、傅振伦等撰就的刘氏年谱；从翦伯赞、侯外庐、杨翼骧、白寿彝等的学术论文，到许冠三探讨刘氏实录史学的专题著作，成果累累。以往学者研究《史通》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使得后来者能够、并且也应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勿庸讳言，《史通》研究需要某些改进。以往对《史通》所做的大量注释类工作是必要的、可贵的，但还要前进一步。《史通》是一部理论著作，所以更应对其理论给予充分的研究和总结。应该看到，刘知几作《史通》，皆在检讨以往全部史学，其批评涉及到当时史学研究的所有重要领域，对前人零散、简略的史评作了一番综合、系统化工作，形成一个空前周密严整的理论体系，因而我们对《史通》理论也必须进行体系性的系统研究，应揭示其理论的结构、层次及各个侧面，并考察其相互联系。以往还有某些论者对《史通》理论观点往往选取式研究，得出结论似有偏颇。如果注意到《史通》理论的体系性特点，就可以较全面认识其理论的总体结构，观察到各个观点的完整说法及有机联系，就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且，由于以往未注意到《史通》理论体系，使得对《史通》理论观点的介绍较为零散，同时也妨碍我们认识和评价《史通》实际具有的理论高度和重大学术价值。因而，探索《史通》理论体系，就为《史通》研究的推陈出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史通》理论体系，是中国史学批评演变之中心枢纽。

《史通》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一个高峰，可以说，考察《史通》理论体系承上启下之表现，对于

整个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具有纲举目张之作用。

史学批评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对以往实践经验的积累及史评成就的继承。除了各个时代的特殊风貌所给予史学批评的特殊影响外，对于史学研究基本要素，基本实践的认识和论评，后人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总的趋势是一代比一代深化、丰富。其间可能会有若干倒退，但不占主导地位。

先秦时期，史学有了初步的发展，出现了孔子、左丘明等史家和《春秋》、《左传》、《国语》等史著。但史学还未有独立地位，这时的史学批评亦处在萌芽阶段，只是对史学的作用，史家的著史态度，史家、史著与时代的关系，文辞与内容关系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朦胧的探讨，并且在形式上往往同综合的学术评论混在一起。

两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标志着史学走向独立。史学批评也逐步从综合性的学术评论中分离出来。班彪的《史记后论》，文长五百余字，是历史上第一篇独立的史学批评专文，着重评论了《史记》的体例、观点，也简略论及了史学的起源、作用和以往史书的发展脉络。这篇文献是史学批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一个转折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史学理论和编纂技术都有显著进步，通史、断代史、传记、史注、谱牒、方志、史钞等大量问世，纷纭各异的史学活动要求史学批评作出反应，从而史学批评在此期获长足进展，史评由片断、零散向初步条理、细密化发展，出现了几部史论、史学批评混杂的著作，还出现了历史上第二篇独立的史学批评专文——《文心雕龙》中的“史传”篇。此文长一千

三百余字，概要论及南朝以前的史家、史书，对史学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编纂技术等问题都有评论。

到了唐代，刘知几集前代史学批评之大成，撰近九万字的《史通》，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专著，严整了史学批评标准，丰富了史学批评方法，对于后世史学批评有深远的影响。后人在史学批评中，或直接引用此书观点，或激烈批驳此书观点，亦有表面反对而“阴用其法”。因而，深入研究《史通》理论体系，有助于揭示史学批评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三、《史通》理论体系是对世界历史学的一大贡献。

《史通》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因此，《史通》的价值就不局限中国史学范围，它也是世界历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如果撰写一部世界史学史或世界史学批评史，若缺少《史通》理论体系这一章节，那么整个古代中世纪的史学理论水准就会大大下降。

但是，现代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水平，却作出了相当低的估价。

英国著名史家，剑桥大学国家讲座教授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认为，“从公元前第二世纪起，中国即有考据学的产生。……惟此一考据学的发展，未能达到一较高境界，不配我们称之为批评。”“中国人能做庞大的分类工作，能编纂惊人的百科全书，并且能出产他们数不尽的琐碎短钉的地方史，但是他们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综合’的境界，他们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①这一武断说法受

^①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第10、1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到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浦立布朗克 (E.G.Pulleyblank) 的批评, 他说, 对于中国史学的缺点, “中国自己的批评家刘知几 (约第七世纪)、章学诚 (十八世纪) 已对之作猛烈的抨击”。“说中国对证据不作科学的评价与分析, 无较高境界的批评, 可是我们可曾晓得中国怀疑理性主义的悠久传统, 灿然蔚成第七世纪与十八世纪的批评著作乎?”^① 浦氏在西方汉学家中, 大概是对中国史学认识最深刻的一位了。他与人合著《中日史学家》 (W.G.Beasley and E.G.Pulleyblank,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具体负责其中的中国史籍部分。他指出, 《史通》为世界上第一部“谈历史写作”的著作, “中文第一部实实在在谈历史写作的论述 (或者在任何语文中我所能发现的第一部)。是刘知几 (661—721) 的《史通》, 完成于七一〇年。”但即使是对中国史学相对了解较多, 较少偏见的他, 也还是不能真正认识《史通》所取得的理论成就, 他在同一本著作中又认为刘知几的批评“象是颇为肤浅”。他所写的“中国史学批评: 刘知几与司马光”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一节, 主要概述刘氏经历和撰写《史通》原因、经过, 对《史通》理论观点是一般性介绍。文字较少, 没有注意到《史通》理论之系统性和博大谨严之特色。

某些西方史家认为欧洲为世界的中心, 西方史学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他们对作为东方史学的主流的中国史学持轻视态度。他们或许也稍微承认一点中国史学的成就, 然而

①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第13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

关键性评价却很低。英国当代史家蒲朗穆 (J.H. Plumb) 的一段话较有代表性。他在列举中国史学具有精细、重视文献、少天命观念等优点后，笔锋一转，“然中国史学之发展，永未突破通往真历史之最后障碍——冀图窥探往事之真相，不顾由此引发与利用过去之时贤冲突。中国人追逐博学，然永未发展富批评性之史学 (the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而富批评性之史学，则为过去两百年西方史学家之重要成就也。彼此永无意念视历史为客观之了解 (objective understanding)，则更不待烦言矣。”^①

这种认识的产生有两种可能：或是对中国史学批评之传统和成就不甚了解而轻下断语，或是有意贬抑中国史学而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

如果真正本着“视历史为客观之了解”的精神，就不难看到一个事实，如同古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曾居世界前列一样，中国古代史学也曾以辉煌的成绩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举凡历史记载的悠久，修史制度的完备，编纂方法的多样，秉笔直书的精神，经世致用的传统，都是举世无双的。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不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巨大作用，而且也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重要的篇章。史学批评专著——《史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古代史学繁荣发达的产物。发达的史学研究和发达的史学批评是密不可分的。《史通》体现出成熟的史学自觉意识，明确将史家与文人、史书与文学之书、子书等区别，专门探讨史学研究的要素与方法。它的出现，填补了世界史学史的有关史学批

① J.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1969, PP12—13. 转引自杜维运“经世思想与中国史学”，载《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三，史学论集，第60页。

评著作的空白。法兰西史家马必雍 (Jean Mabillon) 撰《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 1681), 晚于《史通》近九百年, 并且只专注于史科学方法。^①固然, “富批评性之史学”是“过去两百年西方史学家之重要成就”, 但中国史学家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已撰就史学批评专著。显而易见的结论是, “未发展富批评性史学”的评语是不适用于中国史学的。

由此可见, 阐发《史通》理论体系, 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水平, 也是世界史学史和史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研究《史通》理论体系, 对于建设科学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有不可缺少的借鉴价值。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促进, 随着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深刻变化, 历史学的改革也提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历史学的研究课题, 研究方法应适应新的时代精神的要求。史学的改造, 需要针砭的利器。在史学面临选择和突破的重要时刻, 史学批评的价值更显突出了。

应该承认, 当代史学批评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举例来说, 史学工作者呕心沥血写成的著作和论文, 是否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应有的关注和反响呢? 恐怕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尽管可能有诸种因素, 但史学批评之不活跃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

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文学界对某些作品, 某些作家展开热烈的评论, 从创作主题, 表现技巧, 到作品风格、社会影响

① 参见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自叙〉,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3。

等等，都有各异的见解。甚至对某些文坛新人和处女作就有热烈的争鸣。这不但促进文学的发展，也极大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而史学界则太缺少热烈的批评与争鸣了。不必说青年人及其研究成果，就是当代著名史家及其重要专著也难得引起热烈反响。常见的只是简单的书评和作者简介。事实上，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及不同治史风格的史家，应有百家争鸣式的批评。要探讨选题的价值、研究的方法、体例的利弊、行文的特色……等等。从该选题的研究史方面指出其因袭和创新之处。不同意见的交锋可以使史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正确的意见扩大影响。

还应看到，某些史学成果在实践上、学术上价值不是很大。研究的问题或是过于偏狭琐碎，或是离现实太远，或以佶屈聱牙为高深，或以堆砌玄虚术语为创新，导致社会上出现某些冷遇史学的现象。如果史学批评充分活跃起来，就能够随时检讨史学研究的状况，及时提出建设性意见，从而使史学研究获得一个经常的推动力。

史学批评的创新和突破，有赖于理论指导的进步。为了使史学批评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必须冲破传统史学批评理论的局限，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批评学。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批评学？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史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评价，阐明史学研究的本质、功用、方式、特点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是因其集以往一切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提供了科学的思辨方法，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批评学，去研究古往今来的史学批评，总结其成就和缺失，找出史学批评发展的总规律，建设科学的史学批评理论

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批评和旧的史学批评相比，主要有三个区别特征：

1. 不是单从学术角度平面地考察史学批评，而是将某一时代的史学批评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矛盾中去考察分析。因为史学批评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动的产物，并且由于史学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史学批评不能不反映着社会政治的脉搏，所以需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上，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矛盾上分析，要把史学批评和政治史、思想史的考察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较深入地把握该时代史学批评的特色。

2. 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位史家的史学批评观点，从纵的方面来说，将其置于整个史学、史学批评发展的全过程中考察，给予历史主义的分析评价，看其是否比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从横的方面来说，看史学批评与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的联系。因为史家是扎根于社会现实中的，并非腾云驾雾人物。如果不了解一个史家的政治立场和爱憎情绪，那么对他的史学批评的阐述终是隔靴搔痒之论。

3. 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也进行考证，但不停留于此，要进一步探索史学批评的规律。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抓住史学批评的本质和主流，从突破源头和重点入手，弄清来龙去脉，求得贯通认识。从而使史学批评真正为历史科学的发展服务。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服务。

但是，科学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不能凭空建立，它必须借鉴旧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必须容纳历史上一切优秀的史学批评遗产。史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和发展规律。旧的史学批评就其唯心主义实质和政治立场来说，是不足取的，但其在某些具体史学问题上却可以有符

合实际的认识，客观上也可能触及到某些史学研究环节的规律，尤其是对以往历代浩繁史籍的品评，总结出很多史学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这都是建立科学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同样道理，科学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也必须吸收和改造以往史学批评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史通》理论体系以其丰富的内涵、卓著的成就而体现了特出的借鉴价值。

吴泽师认为，古代东方的经济生产、政治制度、文化学术等，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史学批评亦对世界史学做出突破性贡献。今天，我们更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批评指导下，大力发掘、整理古代史学批评遗产，使史学批评推陈出新。可以预期，东方史学批评的创新和突破，仍然具有推动世界史学突破的意义。

这是一个艰巨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任务，需要广大同行的共同协作才能完成。我在吴泽师指导下写成本文，是为着上述任务所作的初步努力。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58。